

关注

# 真诚的抗疫文艺创作都值得尊重

□张应辉

面对突发的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极具破坏力的灾难,文艺创作者都不能置身度外。文艺家对社会的责任担当,理应发出正能量的声音,为其度时艰创作出具有时效性的文艺作品。

一直以来,文艺界似乎有一种惯常的创作倾向,一些创作者鄙夷时势创作活动,诋毁宣传式作品,不屑加入现时的文艺创作,摆出的清高姿态背后多少有些冷漠的骨髓在。相比较而言,那些赶时宜的文艺创作者则显得更为可爱。只要创作者是真性情的创作,不为借势炒作,而是真诚地直面当下的危难情势,能为苦难带来一丝光亮,提振一份信心,也是值得尊敬的。这些作品可能随大事件的消匿而暗淡,也许无法流芳后世,但它们的出现确实起到了实效的作用,我们切不可抹杀它们在特定时期发出的刹那光芒所带来的温暖。

经历过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我们有理由相信经久传世的佳作会在疫情过后面世,优秀的文艺家对该题材进行沉淀、打磨、精心构思之后,作品的品质可以期待。仅从艺术层面考量,这样的创作价值来得更大,影响力更深远。然而,作为同时代文艺创作整体而言,我们敬仰这样的佳作的同时,也该尊重那些瞬间发光发亮的作品。为顺应时势,那些创作者表现出来的创作冲动、情感冲动成为“抗疫”事件本身的一部分,他们进行的是呼应“第一现场”的文艺行为;无论是响应号召而作,还是主观能动而为,也都秉承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传统,文艺为民,文艺为时,文艺为真善美,这些都是我们的创作初心。

正如当下突发疫情,事关生死存亡,各行各业的人都发挥专长共同面对,文艺家也理所应当积极介入,用艺术之美感染民众,在精神上及时抚慰,心灵上予人润泽。综观文艺发展,文艺创作上存在着“等待创作”与“即时创作”的现象。当文艺遭遇重大历史事件,事关社会变迁的重要关口,有人坐等,有人反应迅速,只要创作初心不变,动机纯正,两者并不矛盾。倘若有能力创作者对社会疾苦缺乏赍嘘的精神内核,只是冷冷地观望,甘做“文艺看客”,光指他人作品瑕疵,这样的文艺品行该唾弃。在此,笔者希望更多知名文艺家及时投入创作。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书画家、曲艺家、评论家……都曾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节点投身其中,创作出富有时代的作品,就算急就,也不曾因为这样的创作而有损他们的名气和地位,更何况这样的创作不乏精品留世。文艺家倘若一味爱惜“羽毛”,不及时发挥“羽毛”的作用,即便他“孔雀开屏”也恐怕鲜有人喝彩。此外,在非常时期,我们的

文艺批评尺度也可以适当放宽一些,多元一些、包容一些。短、平、快的带有宣传、鼓劲效果的作品,即便在艺术上表现平平,但它们发挥的社会功效显著,产生的精神鼓舞作用强大,就可以理直气壮侧重这个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刻意解剖、批评艺术上的缺失,把一群有真诚表达欲望的“初学者”“浅学者”都阻挡回去,而羽翼丰满的“精学者”又多在袖手旁观,等待出手“经世巨作”。试问面对这样一场全面动员性质的“战役”斗争,文艺家又怎么能够完全置之度外呢?

在融媒体环境下,文艺作品的传播渠道变得愈加多元多样,传播速度也变得愈加快速迅捷。最简便的个人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每个网民都可以便捷地传播信息、表达关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利用这些自媒体创作的带有个人化色彩的作品,而处于疫情期间,这些作品转发的速度之快,点击量之多,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介发表的作品。由于自媒体的作品是自由传送,不少作品缺乏规范的艺术品质的评判和甄别,也没有严格的审核把关程序,最后呈现的东西自然显得良莠不齐。相比较而言,一些传统媒介平台,例如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等,包括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由于有较为严格的审稿规程,所刊载的文艺作品在质量上较有保证。但不论哪一种方式,我们都应正视文艺传播渠道发生新变所带来的影响,因势利导,通过媒介的变化和平台优势,进一步拉近文艺创作与时代、现实的距离。

在鼓励人们用文艺的方式对特殊时期、特定形势进行情感表达的同时,笔者更加呼吁文艺精英们积极投身时势现场,切身体验和融入正在进行时的事件,通过多元渠道、多种方式积极创作、推出优秀作品,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当然,文艺创作是个体的,每个人都有参与和拒绝的自由;但身处同一个生活现场,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在场者”,周边的人与情、事与物,无不相互牵连,文艺家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即便是“时势文艺”,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诚如抗疫前线,医生一个都不缺场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人民(中国画) 黄永玉 作

《日夜夜(雕塑) 张得蒂 作



《呦呦鹿鸣(油画) 马蕾 张彩翼 作

医者仁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高尚情操,行仁爱之术,救死扶伤,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内心。当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惧危险、无私奉献,义无反顾,以专业能力和仁爱精神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赢得全社会的敬仰和尊重。日前,中国美术馆在其公众号推出了一批馆藏的医护题材美术作品,以此表达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崇高敬意。

书林漫步

## 欧阳予倩和广东戏剧研究所

——写在《欧阳予倩戏剧期刊选及研究》出版之际 □李歆

了一番深入调研与探讨,并付诸实践。在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指引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广东青年对话剧投以兴趣和热爱,一时间新剧社如雨春笋般在广州市和多所学校纷纷成立,如“蓝白剧社”、“前锋剧社”、“广州女师剧社”、“培正中学‘四二六’剧社”等。

由于时局动荡,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发展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短短3年就经历了两次停办与恢复,至1931年11月,随着广东戏剧研究所所址被省政府收回,这个曾在岭南粤地艰苦维持了3年之久的戏剧机构遂告终结。但3年时间里研究所造就了一大批专业艺术人才,如钟启南、陈西



名、卢敦、何庆、李丽莲、高伟兰等,为广东话剧发展和戏剧改革打开新的局面,输送了新鲜血液,与同时期的南国社、辛酉剧社、戏剧协社等互为声援,成为活跃在岭南地区的一支生力军,为当时沉寂的广州文艺界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促进并带动学校剧运的蓬勃开展,使得广州地区的话剧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

由于广东戏剧研究所经费由广东省政府拨款支持而染上了“官办”的色彩,再加上种种复杂因素,长期以来,广东戏剧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很少得到应有的开掘。笔者从事戏剧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工作数年,在得知欧阳予倩与田汉不仅是戏剧事业上的好战友,更有姻亲关系之后,便着手努力填补上欧阳予倩研究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历经数载寒暑,遍访京沪穗三地多家图书馆、资料馆,整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调研后,笔者终于在欧阳予倩先生诞辰130周年及他所支持创办的《戏剧》系列期刊创刊90周年之际,完成了一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的《欧阳予倩戏剧期刊选及研究》。全书共5卷,由朝华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研究部分对广东戏剧研究所创办的起源、经历、主要成绩、创作与演出之路等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研究;文献部分则收录了1929—1931年间欧阳予倩在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所主办的戏剧专刊,其中《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的《戏剧研究》及《戏剧周刊》约100期,系新中国成立后首度面世,极具史料价值。

广东戏剧研究所是欧阳予倩一生戏剧理论提炼、总结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希望该书的出版对学界深入开展欧阳予倩研究、开创研究新格局有所惠助。

评点

## 阿Q:一个傻瓜英雄?

——评音乐悲喜剧《阿Q罗曼史》 □王柱人

“我生长在中国,对‘阿Q精神’非常熟悉,它完全植根于中国文学。我想知道,这部剧作要向外国观众解释他们完全不了解的‘阿Q精神’会有哪些困难?”2019年11月,上海戏剧学院的音乐悲喜剧《阿Q罗曼史》(孙惠柱编剧、总导演,徐肖作曲,张影伦导演;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在纽约外百老汇演出,一次演后讨论中,一位观众这样提问:同样是第一次观看演出,耶鲁大学戏剧导演系主任戴蒙德教授的观剧体验刚好解答了这一疑问:“这种具有民间智慧、很偶然地成为英雄的傻瓜或者说卑贱者的原型,其实可以在我们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费加罗、好兵帅克这样的角色。”

这一问一答为文化交流研究提示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不能在看待外国作品时快速了解人物性格,切入作品传递的思想感情,往往要看能不能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找到对应物。那么,阿Q这个角色跟费加罗、帅克等究竟有多大的相似性呢?帅克是捷克作家哈谢克的黑色幽默讽刺小说《好兵帅克》的主人公,伏契克说他“掌握了让派遣他去打仗的人输掉的艺术。他采用的方法不是规避和怠工,而是一本正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反而造出许多麻烦和混乱,弄得那些军官们焦头烂额。相比帅克歪打正着的无意识反抗,《费加罗的婚礼》的主人公更主动,面对伯爵恢复“初夜权”的阴谋,费加罗毫不妥协,用智慧携手未婚妻和伯爵夫人,给了伯爵沉痛的教训,终于实现了他的婚礼。

而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其实并没有费加罗、帅克那么可爱,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正面人物,三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大不相同;但三者又都同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饱受剥削和精神虐待的劳动人民,正是博马舍提倡的“不应该是贵族、帝王而应该是第三等级的普通人”的戏剧的主人公。在改编的《罗曼史》中,经过“优化”的阿Q同帅克和费加罗更接近了,虽然他的身上还是有十分鲜明的缺点,但也常流露出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与他的缺点形成了奇特的化学反应,和费加罗、帅克一样,阿Q变成了一个傻瓜英雄。这里的“傻”并不是智慧的高低,而是指那些看起来显得滑稽的行为举动,因为底层人民受到封建阶级迫害的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变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本正经的搞笑。

《阿Q罗曼史》的故事还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阿Q傻傻地硬要送吴妈捡来的半瓶雪花膏以表爱慕之情,赵老爷发现了大怒,将他打出赵家。阿Q去城里碰运气,听了革命党烈士临刑前的演说,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党。赵家的对头假洋鬼子得知后请阿Q去商量,赵老爷怕假洋鬼子利用革命党来害他,当即命吴妈嫁给阿Q,好让阿Q来保护他的家产。但新婚当晚假洋鬼子将阿Q骗出去灌酒,又派人假扮革命党洗劫了赵家。第二天假洋鬼子诬陷阿Q策划了抢劫,急得阿Q喊出革命党的口号,被巡查的把总以煽动叛乱罪名抓起。众人为阿Q喊冤,把总



令团丁等都绑起来,还抓住吴妈说她图谋不轨。阿Q挺身而出要保护大家,“好汉做事好汉当,管他罪过还是冤枉。光棍一条硬邦邦,天塌下来也能扛!”最终阿Q挨了把总一枪,终于实现了他的“英雄梦”,微笑着为保护自己的女人硬朗朗地死去。

阿Q一死,戏本可以结束了,但编导却别出心裁地让未庄的老百姓,连同赵老爷夫妇,在直面阿Q的死亡后不再沉默,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有了反抗意识。在小说中,同样是这些老百姓,也包括跟阿Q一样的穷人,却是在等着为杀人而喝彩。这些看客们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远远不远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改编后的音乐剧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压迫者,突出了底层人民的质朴和勇敢,这是对原小说主题蕴涵的一次大胆转换。剧终,大家围在直立在大理石墓上的阿Q身旁,观众以为演出结束开始鼓掌,假洋鬼子从众人身后挤到台前,喝止观众发声,将一束白菊花献给阿Q。但阿Q三番五次死不瞑目,直到吴妈涂了阿Q送她的口红在他脸颊上献上一个吻,他这才似乎平地咧开嘴,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为正义孤勇牺牲的阿Q成了“英雄”,但死后还执迷于心上人的一记香吻,又暴露了原本那个平凡的傻瓜的本色。假洋鬼子的喝止打破了戏剧的第四堵墙,提示台下的观众,台上的阿Q和百姓已经是“革命”的参与者,而观众则变成了鲁迅批评过的“看客”。编导这样来引发观众的思考,巧妙地呼应了鲁迅小说引导读者“自省”的做法。

将阿Q改编成一个“傻瓜式”的英雄,还可能更容易实现跨文化的传播,让域外受众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传播还可以央视推荐的网络博主李子柒为例,她在YouTube上有735万的粉丝,她的中文视频以中国的传统美食制为主线,外国观众未必懂李子柒的语言,但因为她们有《瓦尔登湖》《低吟的荒野》,在中国的李子柒身上也能感受到自然文学传递的崇尚简朴生活、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素雅意境,得到心灵上的陶冶。《罗曼史》中阿Q的舞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